

# 文心的解密者

序林高《孤独瞭望·英培安小说世界》

张松建<sup>1</sup>

英培安是东南亚文坛最重要的作家之一，兼擅小说、诗歌、杂文、评论、戏剧等多种文体，被哈佛大学的王德威教授誉为“越界创作”的典范<sup>2</sup>。迄今为止，英氏总共出版了26本左右的文学作品，在华文文学领域引起学者的极大兴趣，而且被译成英文、马来文、意大利文、荷兰文等多国文字，正在朝“世界文学”的方向挺进。那么，英培安的文学成就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？我根据个人的研究发现，不揣浅陋，罗列数点如下：

一是“跨区域”写作。英培安不愿仅仅表现新加坡本地的故事而是致力于跨区域写作，经常拓展到马来西亚、中国大陆、香港、

<sup>1</sup>张松建，新加坡国立大学哲学博士，北京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后。目前任教于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。

<sup>2</sup>王德威：《华语语系的人文视野和新加坡经验》（新加坡：南洋理工大学中华语言文化中心，2014年），页54。

台湾，大大拓宽了一己的观察视野。长篇小说《骚动》《戏服》就是如此。《画室》中的人物“思贤”和“宁芳”，足迹远至印度、法国、西班牙。正是这种跨国、跨区域的讲故事方式，使英氏的小说写作具有全新的格局、气象和境界。

二是“历史感”的追求。英培安具有深沉的历史意识，不满足于叙述当下的琐碎的日常生活，而是把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世界，尽力描绘众多人物在历史旋涡中的生存状态及其内心挣扎。《骚动》上溯到1950年代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，下迄1980年代后期的香港、中国、加拿大。至于晚近推出的长篇小说《戏服》，则从1920年代中国广东展开故事情节，一直绵延到1990年代后期的新加坡，时间横亘半个多世纪，这是长时段的叙事空间。

三是“中长篇小说”的实验。本地作家在短篇和微型小说的写作上，已经有了相当可观的成就，一些作家甚至开始了所谓“闪小说”的写作。不过，这些文类由于篇幅太短，只能截取社会生活的横断面，朝向精致小巧的路子发展，缺乏浑厚磅礴的气象。相形之下，英培安在三、四十年的悠悠岁月中，沉潜往复，从容含玩，他先后推出了六部中长篇小说，显示了更大的雄心和成就，牢固奠定了他作为东南亚文学经典作家的地位。

四是“跨语言”写作。新加坡是离散城市和新兴移民国家，华洋杂处，方言众多。在1950年代，甚至更早的时期，苗秀、赵戎、白寒、萧村、岳野等先驱作家，就尝试在文学写作中融入方言土语，不但凸显了写实主义的取向，而且以语言混杂的现象挑战中原正韵，推动本土化、在地化的历史进程。英培安的《戏服》向前辈作家致敬，大量融入粤语方言，显得别具一格。

五是“跨文化”写作。新加坡是多元种族、多元文化的国家。

苗秀、赵戎、黄孟文、郭宝崑等前辈作家，除了表现华族故事，也把笔触延伸到马来族、印度族、欧亚裔等其他族群，展开内容丰富的跨文化写作。英氏《画室》中的印族人物“阿难达”“伽内山”，即是一例。

上述五个方面，尤以前三点最为显著。当然，在英培安运用的众多文类中，“小说”写作取得了最亮眼的成就。

林高先生作为本地资深作家，结缘文学数十年，致力于微型小说和散文写作，斐然有成，荣膺新加坡最高荣誉“文化奖”。他长期执教于莱佛士初级学院，传道授业，作育英才，是称职的教育工作者。退休后，他发挥余热，活跃在新华文坛，从事文学评论，常有作品见诸报端。过去几年内，我获赠林著数种，拜读之后，油然而生“老骥伏枥”的感慨。林高原来写了不少单篇评论，如今转向具体作品的研读，眼下这本《孤独瞭望·英培安小说世界》是迄今为止第一本讨论英培安小说的专书。我有幸先读为快，并略志感言如下。

大凡一个作家，总有偏爱的题材、主题、人物、体裁、技巧。林高在研究英氏小说的基础上有如下发现：“英氏的中篇小说的主干线和聚焦点，人物的际遇和命运，无一不是快乐的、满足的、自在的，用‘孤单’‘落寞’来概括，庶几似之。人物喜欢与自己对话，体内是另一个生命空间。主角人物一直处于寻索的彷徨，不断挖掘自我内心的真实——情欲的、道德的、政治的、艺术的——其叙事重心在于展示人物神貌的模糊性。”这的确是重要的观察。我也曾指出，英培安的作品叙述的大多是奋斗与失败、流亡与回归、爱欲与冒险、疾病与死亡的“最动人的哀歌”。我借用詹明信对本雅明的评论，概括英氏小说的精神结构——

于是，从本雅明文章的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那种忧郁——一个人的消沉、职业的挫折、局外人的沮丧、面临政治和历史梦魇的苦恼等等——便在过去之中搜索，想找到一个适当的客体，某种象征或意象，如同在宗教冥想里一样，心灵能让自己向外凝视着它，在里面觅到短暂的哪怕是审美的慰藉。<sup>3</sup>

在英氏作品的主人公身上，往往有平静的哀伤、倔强的自尊心、无所不在的孤独感，令人想到鲁迅、郁达夫、陀斯妥耶夫斯基、索尔·贝娄的一类文风。华校生，小知识分子，反英雄，失败男人，流落海外的有志青年，彷徨无措的草根百姓和边缘人，这就是英培安喜欢塑造的人物形象。概言之，“孤独”的确是英氏小说最显著的主题。林高抓住“孤独”这条中心线索，作为切入点，把这位作家的全部小说文本贯穿起来，细心阅读，每每有独到发现。在林高看来，英的六部中篇小说——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》《孤寂的脸》《骚动》《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》《画室》《戏服》，他的两部短篇小说集《不存在的情人》和《寄错的邮件》——无不深刻表现了一种痛彻肺腑的孤独感。这种孤独感，不同于中国古代文人的伤春悲秋的寂寞情怀，而是有比较深刻的现代意识和批判精神，从小处来看，它与作家本人的精神气质、文学趣味有关；从大处来看，是本土、区域、全球的历史与社会、文化与政治的变迁的结果，因此意味深长，值得深入解析。

在结构上，林高这本书使用“总论”和“单篇评论”相结合的看法。在单篇评论部分，他逐一介绍英氏的六部中篇小说和两部

---

<sup>3</sup> 詹姆逊著，钱佼汝、李自修译：《语言的牢笼：马克思主义与形式》（南昌：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，1995年），页48。

短篇小说集的主要内容、人物形象和思想主题。在总论部分，他使用虚实美学、互文阅读，详细分析了这些小说的重要面向。这里所谓的“互文阅读”，应该稍作介绍。林高发现，英氏的现代诗和小说往往可以作为互补文本来阅读，两个短篇小说集《不存在的情人》《寄错的邮件》中的多数作品有一个共同的“出走意识”：主人公因为不同意主流社会的价值标准而采取自我流放的态度。

《画室》和《戏服》是英氏晚年最重要的小说，林高特意把两者进行对照阅读。这也是英培安在其评论集《阅读旅程》中采取的一贯做法，旨在发现作家的中心关怀和精神结构，一言以蔽之曰：“一种寻索自我生命位置的努力。”林高坦承，他这样做有三个原因。第一，这两部小说有相似的叙事策略和写作技巧（所谓“虚实美学”）。第二，主人公经过一番挫折横逆，终于找到自我的主体位置。第三，他们对个人理想的坚持也预示新加坡之国家艺术场域的景观。林高对《画室》的两个空间——“画室”和“山洞”——也有细腻精彩的分析，揭示其中蕴含的象征涵义。他指出，《戏服》的对话，刻意使用粤语，不仅符合人物身份和关系，也凸显相关人物的“曾经在场和在场意义的消失”。林高发现，英氏身上存在一种吊诡现象，即，身世背景与文艺趣味之间的奇妙错位——

在创作上英培安崇尚西方之美学，思想上亦以西哲为表率，取向鲜明。有趣的是，受华文教育的背景，早年的家庭教育，却潜伏在血脉里，总在“发声”时流露端倪。英培安受现代主义启发，作品里着力于描写生存的困境、挖掘人物的内心。一个处于边缘上的知识分子的跌跌撞撞尤其叫人感到

“活着”的荒谬与荒凉；然而，却没有陷溺于虚无与颓唐。眼看梁剑秋到了谷底绝境了，却仍出现梁如秀的眼睛，一线光芒在闪烁。

英氏的现代诗与小说之互补互动，是其匠心独运的显现，这个不被人注意到的现象，也被林高准确捕捉到了。英在小说的创新实验上倾注了很大心力，花样翻新，炉火纯青，置诸东南亚华文文坛，几无出其右者。《不存在的情人》和《寄错的邮件》属于英的“少作”，收录13个短篇小说，现在看来有些青涩单薄，不过仍有粲然可观者。林高指出，这两部小说集大量运用所谓“诗化叙事”，令人耳目一新。这些小说放弃了紧凑张力的情节叙事，不追求戏剧性的矛盾冲突，而是凸显松散洒脱的散文风，使用较多的视觉意象，追求抒情格调、诗意氛围和画面效果。我的看法是，诗化叙事和抒情小说当然不是英的个人发明，实际上，中西文学传统都有大量案例。例如，英国作家弗吉尼亚·沃尔夫（Virginia Woolf），德国作家赫尔曼·黑塞（Hermann Hesse），法国作家安德烈·纪德（Andre Gide），美国的托马斯·沃尔夫（Thomas Wolfe）。<sup>4</sup>至于中国作家，那就更多了：鲁迅、郁达夫、沈从文、萧红、张爱玲、孙犁、汪曾祺、林斤澜、何立伟、迟子建、毕飞宇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英培安对抒情小说和诗性叙事的巧妙运用，不仅拓展了新马华文小说的技巧范围，也见证了他多方面的文学才华和批评想象。需要补充的是，这13篇小说大多表现青春期的性苦闷，存在的荒谬和无常，生命的孤独和荒凉，人性的冷漠、自私和残忍，萦绕于字里行间的，大多是疾病、梦魇、鬼魅、情欲和死亡的主题。进而言

---

<sup>4</sup> Ralph Freedman, *The Lyrical Novel: Studies in Herman Hesse, Andre Gide, and Virginia Woolf* (Princeton, NJ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63).

之，除了诗化叙事和抒情风格，英培安的这些小说也有讽刺幽默的面向。例如，《吴迪的故事》讽刺一位才华枯竭而又自命不凡的作家，与钱锺书之短篇小说《灵感》中的那位蹩脚作家遥相呼应；英氏那种汪洋恣肆、夸张变形的笔法，或许从法国中世纪作家拉伯雷的名著《巨人传》吸取了灵感。英的短篇小说《圣诞的快乐》，嘲弄人性的自私虚伪，揶揄浪漫爱情的虚浮不实，也与钱锺书的小说《纪念》有相似旨趣。

林著基本上运用的是印象主义批评，这种方法源远流长。十九世纪法国批评家法朗士认为，“批评就是灵魂在杰作中的冒险”，这是印象主义批评的经典定义。“五四”以还，中国的梁宗岱、刘西渭、唐湜都是印象主义批评的代表。林高有长期的写作经验和敏锐的文学感悟，他谦虚地把自己的评论定位于“软性评论”。所谓“软性评论”者，指的是不追求学院派的正经八百的论文写法，而是以一般读者为分享阅读经验的对象，稍加运用西方哲学美学，针对文学作品进行探秘和解码，呈现优秀作品的素质和精髓。林高把英培安所有的长篇、中篇、短篇小说逐一精读。他非常熟悉这位作家的构思立意，他的文字简洁清通，风格轻松流畅。林高指出，英培安受到现代主义启发，着力描写现代人的生存困境、精神危机和生命荒凉感，但是没有陷入虚无和颓废，例如，“眼看梁剑秋到了谷底绝境了，却仍出现梁如秀的眼睛，一线光芒在闪烁”。林高发现，《画室》折射的是主人公面对孤独和死亡的深层寂寞、面对沧桑和挫败的无奈悲叹，“然而，有一信念仍贯穿其间：对爱情的向往、对艺术的执著、对人性的信任”。

解读《孤寂的脸》，林高也有自己的思考。在这部中篇小说中，英氏通过讲述男主人公的家庭故事，表达他的道德困境和心理危机。小说描写了主人公对父亲的畏惧、厌恶、疏离和忏悔的复杂

关系，这种关系体现在一系列的匪夷所思的动物比喻上，包括“龙虾”“虾米”“死鸡”“干鱼”“老狗”。至此，人伦温情已流失净尽，人性的丑陋、自私、冷酷和残忍，于此暴露无遗。毕竟，所谓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，也正是现代主义文艺竭力表现的主题。这个精彩的阅读发现，显示了林高的深刻理解。我甚至觉得，从文学伦理学批评和现代道德哲学的视角，重读英培安的文学作品，或许有更多的精彩发现。

林高认为，《我与我自己的二三事》的叙事结构大体上沿着“我和我自己”的合与分的脉络，因作者使用复调的叙事策略，主人翁的意识成长呈现复沓回旋、正负交叉的状态，展示更为幽微起伏的心理真实。他认为这部小说中的镜子意象有独特的双重含义。这与我的观察不谋而合。《旧唐书·魏征传》有云：“夫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替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准此，照镜与中国人的卫生习惯、道德修身、国家治理发生了隐喻性的关联。我曾经综合英氏的现代诗《手术台上》和中长篇小说《一个像我这样的男人》《孤寂的脸》《骚动》《我和我自己的二三事》，认为“照镜”在此具备多重的复杂涵义：身体的重新发现，情欲的启动，自我认同的追寻，男性气质的重构，以及，道德观念的回归。<sup>5</sup> 林著强调，英的小说《骚动》的第四章，子勤的叙述是不可靠的叙述，而且，此书叙述的事件成碎片状，断断续续，读者必须把它们拼贴、组装、接合起来，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画面。我觉得，这是准确的观察。不过需要补充，英培安对身体的历史性的描写大大缩减了，社会内容被压缩了，人物从外在世界退缩，固守内心孤岛的静态风景。现代小说的一个重大变化是：

---

<sup>5</sup> 张松建：〈论英培安的身体书写〉，《华文文学》2017年第1期（2017年2月），页72-85。



从事件的序列性转向共存性，从历史性转向空间性，从时段转向区域，从传记转向地理学。这种小说叙事学的实验，价值一望而知，但是若发挥到极致，也易滋生流弊。为了追求现代主义，英氏的小说打破直线性叙事模式，致力于叙事的空间化。不再强调流动性的时间，而是专注于静态的空间。不致力于表现人物命运和身份认同的叙事结构，而是专注于静态琐碎的细节描写。借用卢卡奇契的著名说法，我觉得《骚动》的“描写”远远多于“叙事”，甚或有自然主义之虞。

当然，印象主义批评也不免有其缺陷，主要表现是缺乏深厚的理论素养和复杂的阐释框架。英培安毕竟是东南亚华文文学的重镇，读书勤奋，抱负远大，钻研存在主义等西方哲学，对福柯、弗洛伊德做过翻译介绍。他的作品，技巧精湛，主题复杂。在小说叙事学上，英氏不断创新实验，从复调小说、后设叙事、法国新小说、意识流小说、心理写实主义、荒诞派小说、黑色幽默、魔幻写实主义等汲取灵感源泉，自取所需，为己所用，取得很大成就，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。同时，英氏小说带出了许多有关社会和历史、文化和政治的现象，必须放回到本土、区域和全球的多重语境的交叉地带，进行脉络化、历史化的阐释，揭示众多问题的互动交织和演变踪迹。所以，要想深刻了解英培安小说的复杂景观，还有必要运用文化批评理论，具备历史学、社会学、政治哲学、道德哲学等知识源流。

此书还有一个亮点，那就是，林高为了钻研英培安小说，曾经多次访谈这位作家，获得了第一手的口述史资料。口述史（oral history）是现代学术研究的基本方法，具有现场感、真实性，与书面文献互相补充。此书第一章名为〈与英培安聊起那些年月〉，再现“一个作家的形成”之具体过程，对于新马文学研究者来说，是

弥足珍贵的资料。英氏从公教中学到卫理中学，再到义安学院中文系，逐渐培养起来对文艺的热爱，又受益于李辰冬等一众师友的启发。后来，他办杂志，开书店，经营社会资本，开拓一己的文学事业，而且介入公民社会，以至于阴差阳错，身陷牢狱。后来，为了寻求更大的发展空间，英氏自我流放，移居香港。这种执着冒险的精神，令人想起《尤利西斯》的作者乔伊斯，后者为了追求文学梦想，毅然离开爱尔兰，流寓欧洲大陆，即使过着贫穷孤寂的生活，也在所不惜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英培安的人生态度，与他崇拜鲁迅、李敖、罗素、弗洛姆的自由主义思想有关。他博览群书，好学不倦，颇受萨特、加缪的存在主义哲学的启发。作为新马文坛最早的现代主义者，英氏阅读台湾作家痲弦、周梦蝶、杨牧的现代诗，以及欧美作家艾略特、卡尔维诺、索尔·贝娄、米兰·昆德拉、法国新小说作家的作品，博采众长，转益多师，造就了宽广开放的视野和深刻敏锐的观察。这些重要的传记资料，都可以在林高这本书中找到。

林高钻研英培安小说有年，他的精彩见解尽现于此书，相信读者一定会深有所获。新加坡独立至今，已有半个多世纪了，新华文学是一块亟待开采的富矿，我期待更多学者致力于此，踵事增华，发为高论。倘如是，则幸甚矣。是为序。

戊戌年仲夏，记于星洲之停云堂